

考据与思辨： 文史治学经验谈

文史哲编辑部 编

文史哲丛刊



创立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史哲丛刊

考据与思辨：文史治学经验谈

文史哲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据与思辨：文史治学经验谈 / 文史哲编辑部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文史哲丛刊）
ISBN 978-7-100-07542-8

I. ①考… II. ①文…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947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考据与思辨：文史治学经验谈

文史哲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542-8

2013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3/8
定价：46.00元

出版说明

《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5月，起初是同人杂志，自办发行，山东大学文史两系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先生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1953年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之一，迄今已走过六十年的历史行程。

由于一直走专家办刊、学术立刊之路，《文史哲》杂志甫一创刊便名重士林，驰誉中外，在数代读书人心中享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她所刊布的一篇又一篇集功力与见识于一体的精湛力作，不断推动着当代学术的演化。新中国学术范型的几次更替，文化界若干波澜与事件的发生，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提出与讨论，都与这份杂志密切相关。《文史哲》杂志向有与著名出版机构合作，将文章按专题结集成册的历史与传统：早在1957年，就曾与中华书局合作，以“《文史哲》丛刊”为名，推出过《中国古代哲学论丛》、《汉语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等；后又与齐鲁书社合作，推出过《治学之道》等。今者编辑部再度与商务印书馆携手，推出新一系列的“文史哲丛刊”，所收诸文，多为学术史上不可遗忘之作，望学界垂爱。

文史哲编辑部

商务印书馆

2009年10月

编辑工作委员会

顾 问 孔 繁 刘光裕 丁冠之

韩凌轩 蔡德贵 陈 炎

主 编 王学典

副主编 周广璜 刘京希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建 王学典 刘 培 刘京希

李 梅 李扬眉 宋全成 陈绍燕

范学辉 周广璜 贺立华 曹 峰

目 录

范式·路径·方法

考证在史学上的地位	黄云眉 / 3
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	殷孟伦 / 15
根柢之学与博与专的道路	
——我的治学一得	姜亮夫 / 33
詹詹录	
——我的治学一得	程千帆 / 40
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	赵俪生 / 48
治学漫谈	孙昌熙 / 53
治学补谈	缪 钺 / 61
读书要辅之以笔下功夫	何满子 / 68
广谱目录学与历史研究	胡道静 / 72
漫谈学习和研究	陈科美 / 80
古文字学的基础工作	李学勤 / 88
关于练基本功	霍松林 / 94
漫谈史学研究	高 敏 / 102

读古书须明其义例	王运熙 / 112
刻苦钻研 大胆探索	田余庆 / 117
谈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	傅衣凌 / 123
如何研究国学	张岱年 / 132
中国思想和思想史研究的视角	沟口雄三 / 135

治学之道

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	郑鹤声 / 153
我对于研究史学的一些看法	张维华 / 185
史海夜航	
——我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看法	秦佩珩 / 189
我的读书法	牟世金 / 199
治学二题：读书和科研	金景芳 / 206
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	傅衣凌 / 213
求学过程中三点粗浅体会	徐中玉 / 222
漫谈学习和研究隋唐史	韩国磐 / 232
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	彭 明 / 238
治学经验谈	张岱年 / 250
我怎样学元史	杨志玖 / 253
我的一种治学方法	
——以《王船山思想体系》为例	蔡尚思 / 260

三十年自学生涯	萧 兵 / 270
谈谈我的治学经过	王仲荦 / 280
我是怎样研究郑和的	郑鹤声 / 288
我的选择	李泽厚 / 295
治学浅议	张岂之 / 303
整理与研究异同辨	
——有关古籍整理研究若干问题之一	姜亮夫 / 311
从“杂学旁搜”到“观于远近”	吴调公 / 321
隋唐史研究漫谈	李季平 / 329
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	刘祚昌 / 336
华岗的自学经历	谈滨若 / 351
我与《书目答问》	来新夏 / 361
初学清史必读书目	王锺翰 / 367
明史学记	黄冕堂 / 371
如何研究洋务运动	
——访李时岳教授	李时岳 李平生 / 376
把握自我 勤奋开拓	方立天 / 386
关于胡适、李宗仁的口述历史及其他	
——唐德刚教授访问记	徐承伦 / 391
张维华自传	张维华 / 408
追求有思想的学术	王元化 许纪霖 / 417

记学与追思

顾颉刚先生治学的几个特点	蔡尚思 / 423
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殷孟伦 / 429
冯沅君先生的治学精神	袁世硕 / 436
忆陈寅恪先生	杨向奎 / 441
记学	
——纪念马宗霍师、赵少咸师	殷焕先 / 447
师门记学	杨向奎 / 456
罗常培先生的治学精神	
——纪念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罗泽珣 / 461
五四时代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先生	杨向奎 / 471
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	汤志钧 / 476
殷孟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傅根清 / 487
我的老师费正清	[美] P. A. 柯文 / 495
美学家蒋孔阳先生的治学之道	李衍柱 / 502
忆陈寅恪师	郑 欣 / 511
钱穆先生治学方法的三点特性	郑吉雄 / 518
求实创新 博大精深	
——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	徐鸿修 / 529
后 记	文史哲编辑部 / 545

范式 · 路径 · 方法

考证在史学上的地位

黄云眉

假如有人问，在今日的学术园地中，考证这门工作还需要吗？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应之曰需要，尤其是在编纂新史的资料问题上显出它的重要性。

这是应该的，新中国的人民需要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需要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到底什么样？需要知道他们过去——近代以至于古代的生活状况到底什么样？然而要满足这个要求，却是一桩十分困难的事情。不必说中国过去浩如烟海的所谓“乙部”书，固然没有一部配给人民看；即如今日少数学者以新的立场新的观点所写成的那些准备给人民看的近代史或古代史，我也以为不能完全无问题，这不是说他们不够努力，而是说他们的努力受了一定的限制。限制的原因：

其一，中国的伪书太多了，过去的历史，大部分是糅杂地采用这些伪书做资料的，愈古则伪书愈多，因而愈古的历史，正确的成分也愈少，如果不把这些伪书褪掉它们的华衮，赤裸裸地显现出它们的原形给大家看，它们将永远是历史的顽强的敌人。我曾有一个时期准备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以外的伪书来一个大包围，同时

还打算把重要的伪文也包围在内，作为这部书的一个附编。但为了衣食奔走，断断续续的时间，不适合于做这种獭祭工作；又为了碰到稍感繁赜的问题，往往花上五天十天还得不到解决，有时甚至像治丝一样，愈治而愈紊，终于使我渐渐地松下了劲儿，而把这计划甩开了。不过事实上我还没有真正领略过考证的困难，自从1939年开始考证《明史》，到现在已过了十年，花了我不少的辛勤，才点点滴滴地积累了三十万言，却只及全书一半，这才使我联想到当时居然敢作一网打尽群伪的计划，那是一时的傻勇，其实是干不了的。自然，这仅仅是就我个人而言；但如果贤愚相隔不至于十分辽阔的话，那么一个历史家打算写一部通史或专史，只要他不敢学司马迁闭着眼睛会把巨鹿之战描绘得像自己也在“作壁上观”一样的那么历史小说化，我想他踱进了这样的光怪陆离、冒牌杂陈的大铺子里去找他所需要的资料，他一定会考虑到信手拈取这些资料的严重的危险性。他为了对自己所写的历史负责起见，必须先把这些资料加以忠实的审订，因而这个通史或专史的编纂者，同时也必须是该项史料的考证者，试问他的时间和精力，能不能允许他这样做？

其二，过去的历史，根本是统治阶级谎话的代名词。写历史的目的，一言以蔽之，无非企图替统治阶级对人民说明他们所有一切残酷的无尽的剥削，就是浩荡的皇恩，人民应该挤出更多的血汗来报答它的。而所有非历史形式的一切著作，不论真也好，伪也好，在维持剥削阶级的政权的目的上说来，大部分并无二致，所以对于资料的采择和运用，不在断断于斥伪而存真，反正历史本身就是以一个阶级欺骗另一个阶级的伪东西，只要和他们所要说的谎话的条

件不冲突，什么荒唐的记载都可以放进去的。即就司马光的编《通鉴》来说吧：他虽曾做过不少时间的考证工作，但他所需要的资料，本来就是统治阶级现成的谎话资料，可以左右逢源而不感匮乏，他的从事于考证，只是把这些资料整齐划一，尽可能减少颠倒抵牾之迹而已。那么为什么历史中仍会有说统治阶级的坏话的记载呢？这是因为一个踏着人民斗争的血背而爬上统治宝座的好汉，他希望能那个已被推翻的旧政权写成一个不成模样的东西，“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那他才有理由称他的“取而代之”的行为为正当，而像他这样有野心的继起者，则没有理由再踏着人民斗争的血背向自己的统治宝座爬上来，这种心理可以说是很自然的。孔子修《春秋》的所谓“笔削”精蕴，几千年来就是被这些好汉们这样地重视着，而写历史的史官们，也总是如法炮制，说本朝如何如何地好，前朝如何如何地坏，其实本朝的新史官，也许就是前朝的旧史官哩！因而过去的历史，有好话也有坏话，因而它们的说好说坏，是否根据事实，或者歪曲事实，都不能没有问题，因而我们不但对于这些旧史中的好话要重加估计，连这些旧史中可以证明过去统治阶级的罪行的坏话，我们也不能一概无条件地信任它们。由此可见在这些说谎话的旧史领域中，不容易碰到新史可以现成运用的资料，无疑地是一种事实；不过几千年人民苦痛的生活，也就是几千年人民斗争的生活，在旧史领域中及其他文字中，不能不让它变成一股愈积愈大的淤流，也应该是一种事实。鄙意以为新史的资料，除了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六朝卷轴，金石镌刻，古陶明器，以及契丹女真蒙古西夏的遗留文字，高山边地开化较迟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外，我们如果能从这些旧史谎话后面

仔细地去找，再从统治阶级所仇视的那些“名教罪人”的“禁毁”诸书中，以及他们所鄙视的“不登于著作之林”的俚俗文字中，仔细地去找，我想人民过去——近代以至于古代的生活状况，还是可以活生生地反映在我们的眼前的。自然，这是一种相当麻烦的工作，但又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过程，因而这个通史或专史的编纂者，同时又必须是该项史料的搜辑而兼考证者，试问他的时间和精力，能不能又允许他这样做？

准是以言：今日的历史家，受了上面所说的资料方面的限制，他想写一部真正人民的历史，比之过去写历史的困难，真不啻倍蓰了！

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我们如果要求今日的历史家一身而二任，一面编纂，一面考证的话，我可以武断地说：即使他是一个天才的历史家，他这部想写的历史，一定也会得到“头白可期，汗青无日”的结果的。

这不是因为我曾经搞过一些考证工作，故意把考证提高它的重要性，故意把编纂历史的附带工作，提高为专任工作。我对于考证没有一些成绩，现在简直有些怕谈它，但一切都依条件地方时间为转移，在今日的中国还没有一部能完全满足人民要求的信史的条件下，我觉得考证工作不能由编纂者兼任，也许不是我个人的偏见。建筑材料的好坏，必然会影响到建筑物的坚固与否，这是不必在这里加以解释的。问题是在于旧史既以欺骗人民为目的，资料的真伪可以不拘，现成的资料又随处可以碰到，而看的人本来就不多，大部分人不会看，会看的则不愿看，能把二百九十四卷的《通鉴》从头到尾地来读它一遍，或者先朱后墨地来点它几遍，到底是很少

的。秀才们能看完《通鉴辑览》已不多了，有一位老秀才甚至问过我做《史记》的是哪个人哩！为应付这种要求而造的房子，自然来一个包工制就行了。可是新史是人民自己的历史，自己绝不能欺骗自己，不但伪资料和现成的资料非经仔细的审订，不能立刻加以运用，还要加上一番点滴的新资料的搜集工作，而它的读者又一定会普遍到千千万万的人民，为应付这种要求而造的房子，当然要造得它“风雨不动安如山”才行。那么，假使能在一个配合着预定的建筑图案的要求下，来替建筑工作做一番极忠实极充分的准备工作——建筑材料的采办和检验工作，然后再由那些具有高度技巧的大匠们，按照他们预定的建筑图案绰有余裕地来运用这些又多又好的材料，我想，他们的成绩的给予房主人的满足，比之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的包工建筑，距离是应该很远的了。并且我想，这不但房主人会要求这样做，连那些大匠们也会要求这样做哩！

我们知道考证这门工作，在清代乾嘉间来了一次高潮后，在近三十年间又来了一次新的高潮，这两次考证高潮，当然都有它们的时代背景，而就整理古书方面来说，是无可否认的都建立了不少的功绩，换句话说，已替今日的历史做了一部分“筚路蓝缕”的工作。虽则少数的考证学者，不免过分估计了考证的效用，以为考证即是著作，有的甚至以为考证重于著作，这简直等于说只要准备了建筑的好材料，就不要再去建筑一样的荒唐可笑，因而也引起了少数学者对于考证工作的反感。其实这种过分重视考证的错误，本来不是考证本身的错误，正像有些理学先生们“宁疑孔孟不敢疑程朱”一样，到底是尊程朱之学者的错误，而非程朱之学本身的错误。一样的不龟手的药，“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我们难道不

可以使过去“为鬼服务”的考证工作，变作“为人服务”的考证工作吗？所谓“为鬼服务”，也就等于说“为考证而考证”，而这些考证的对象，在整个的历史上，在社会生活或制度的过程上，是否会起一种什么问题的解答作用，他们是不管的。乾嘉间的考证作风，大抵就是这样，因为那时的考证学者，早就没有清初诸大师借考证为“经世”的手段的企图了，当然就考证的方法来说，他们是比较清初诸大师已进了一步。至于近三十年间的考证学者，则一般地已能知道他们所考证的对象，应该和整个的历史、社会生活或制度的过程发生关系，即使是一字一句之微的审订工作。他们所用的考证方法，无疑地也比乾嘉间更科学了。不过他们还不能从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去考证那些有问题的问题，因而也不能保证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不犯错误。所以认为在今日而谈考证，不过是两期考证高潮的余波，那是一种对今日人民需要的历史不负责的话。照我的管见，我们除了批判地承受这两期考证所给予我们的宝贵遗产外，同时必须再来一次更新的考证高潮，才能应付今日的历史的需要。

这里我得先说一说今日考证的主要工作是什么，然后再说明这个更新的考证高潮，应该在有目的的有计划的集体考证工作中来表现，并其可能的理由。无疑地，新资料是新史的骨干，新资料的编辑工作和考证工作，是比较困难而专门的，是必须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有收获的。但就新史内容的分量言，今日考证的主要工作，大部分还是旧资料的改造工作，换句话说，就是用新的立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把旧资料像旧知识分子一样地改造过来的工作。我上面说过中国过去大部分的历史，是糅杂地采用伪书做资料